书摘

眼睛向下是一种工作方法

□陈先达

上与下不是对立的。但眼睛“向上”与“向下”是对立的，因为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正如不要“唯书”而要“唯实”一样，“书”即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与“实”不是对立的，但“唯书”与“唯实”作为两种工作方法是对立的。

眼睛向下，是深入群众的另一种说法。相对于领导、相对于干部，群众属于“下”。这个“下”，不是地位的定性，而是对领导和群众关系的形象比喻。如果眼睛向上，那就是“唯上”，是非对错以领导的标准为标准。

眼睛向下，就是立足实际。因为群众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者，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国家全部政策措施的最终接受者。任何政策的实施最终总是要落实到群众头上。正确也好，不正确也好，它的效果如何，满意不满意，群众感受最深、最真实，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基本成员，是政府各种措施实施对象的永远的在场者和接受者。他们虽然不一定能从理论高度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但他们最切实感受到问题所在。从这个角度说，眼睛越向上，对实际情况越隔膜，越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越往下走，则越容易了解民情、民意。唯物主义要求眼睛向下，因为“下”就是真实的实际情况所在。

基层干部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具有双重性：对上级领导他们是下；而对他们“治下”的老百姓，他们又是上。为人民办好事的是他们，因为他们最接近群众；可办坏事称王称霸的也可能是他们，因为他们直接管理群众，是群众的“顶头上司”。古代政治家都懂得严格选择基层官员的重要性。古人说“不怕官只怕管”，因为真正与百姓打交道的是基层干部，而不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并不可怕，因为他们会走。这就是领导干部必须下基层，必须直接深入群众而不能只听汇报的道理所在。

为什么毛泽东要强调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是眼睛向下。毛泽东说调查研究好比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如同一朝分娩。还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就是重视唯物主义。要了解对象的情况，必须了解对象的历史和现状。调查包括了解对象的历史和现实，了解历史就是了解问题如何产生发展，了解现实就是了解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因此，调查既包括历史，也包括现状。这是唯物主义原则，也是群众路线的原则。调查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研究是从资料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因此，调查和研究既可洗刷唯心主义，又可防止官僚主义。这种基于唯物主义的方法当然不同于唯心主义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一个是走出去，到实践中去，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一个是闭门造车，拍脑袋的方法。结果肯定完全不同。当然，调查既是唯物主义的又是辩证法的，因为事情处于变化中。调查与研究不可分，光调查不研究，一大堆死材料也是没有多大用的。这是另话，这次不说。

实际工作，要眼睛向下；我们搞哲学，也要眼睛向下。说句实话，搞哲学眼睛向下最不容易，因为有些哲学家一直宣称哲学本来就不是为群众的，哲学是哲学家的事，与群众无关。哲学凌驾于群众之上是旧哲学的最大缺点。如果你们抱着这种思想，可以写几篇文章，但不可能成为思想家，更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新突破。你们不要把毛泽东说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本里、从课堂上解放出来看成一种政治号召，实际上这是一条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摘自陈先达《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题目有改动。

名人读书录

博采众长成一家

□王学斌

晚近学人钱穆在其《师友杂忆》中曾有这么一番记载，专述北大“狂人”刘文典先生：

“（刘）乘清华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不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熄未尽，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

若单观此段，刘似是个不甚爱惜古书的烟鬼。常言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别看钱文里的刘文典难入大雅之堂，其实人家可是民国数得着的学术名角，他在《淮南子》《庄子》等古典上的造诣，堪称独步一时。古人治学能有精进，往往不离乎请益与自修。刘亦是如此，他之所以博洽多闻，实离不开身边师长之言传身教与自己的刻苦潜修。

刘文典能顺利步入学术堂奥，有3位名师点拨。首位师傅乃近代革命家陈独秀。刘早年进入安徽公学读书，陈也恰任教此地，于是刘得以充分领教其风采。陈上课海阔天空、激情四溢，时不时地就点评时政，臧否人物，刘文典最早的革命启蒙，始自陈之教导。

刘所处时代，正是新旧杂陈、学术递嬗之际，若说陈独秀是近似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课老师，那么要想深得传统学术精义，恐怕还得依靠师傅带徒弟的老路子。从老师角度审视，他可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一旦发现好的读书种子，不管其家庭、地位、年龄等因素，皆可纳入门下，这与当下教育体制颇为不同；从学生角度而言，如果真想拜某位德高望重、水平顶尖的大家为师，那就执弟子礼，必须恭恭敬敬、听从教诲。虽说传统模式陈旧，但确有其合理之处，老师尽心，学生用心，书卷气浓厚，铜臭味淡薄。刘文典便是依此路数拜入第二位恩师刘师培门下。据刘回忆，当时“请了一位排满排得最厉害的经学大师来当教员，这位先生是现代数一数二的鸿儒，经学、小学、文学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他教人的方针只有八个字，就是‘寝馈许书，钻研萧选’”。“二刘”从此惺惺相惜。在刘师培的悉心教导之下，刘文典打定了“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的信念，常与《太平御览》《群书治要》《白氏六帖》《初学记》《意林》等为伴，致力于“追效昔人，示其稽古”。

刘所处时代，亦是革命兴起、改天换地之时，革命领袖孙、黄、宋等人常驻东京，指挥起义，章炳麟也赫然在列。此时的太炎先生，大名已声震华夏，冠盖亚洲，成为众多留日学生拜访求学的首选。初来乍到，刘文典经朋友介绍，去拜见章。略加寒暄，章问刘文典：“你从前拜过什么师？读过什么书？”刘明知他和本师刘师培先生已经翻脸交恶，但是又须如实道来，只好说：“我自幼从仪征刘先生读过《说文》《文选》。”章一听他是刘师培的学生，高兴极了，拉着他海阔天空谈了几个钟头，其间对刘师培的学问推崇备至。他忽然又想起来说：“是了，申叔对我提到过你。”可见，章太炎绝不会因人废学，此或即大师境界。从那天起，章门弟子阵容中又添了刘文典这么一位。在章门下，刘系统聆听《说文解字注》《音学五书》《广雅主疏证》，其经学、小学功底精进。

遍访名师后，刘融诸家之长，汇为一炉，形成自身治学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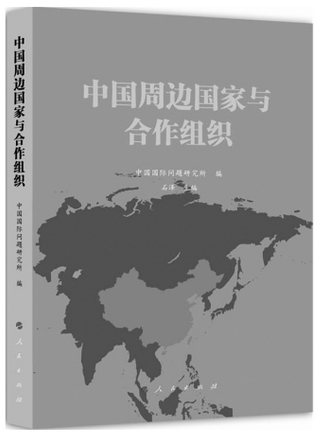
首先，“一字之微，微及万卷”。刘认为，治学“是个专门的业务，你要没有‘日思误书更是一适’的癖性，千万不要去尝试。得鱼忘筌，误了你自己，把‘己亥’改成‘三豕’，又害了别人”，因此做学问一定要做到严谨，不能望文生义，似是而非，只有态度严谨方能避免研究中的讹误。

其次，主张学术救国，经世致用。明清之际，经世学风兴盛，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便是此中翘楚。他们主张研究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难题，由考据古代典籍路径着手，进而阐发自己的观点用于社会改革。刘文典深受影响，积极主张学术研究应该经世致用。“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唤醒国人爱国意识，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历史渊源分析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如《独立评论》杂志连载了刘文典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发动机》一文，指出日本是“举国一致，定要吞并中国和亚细亚洲，以尽大和民族的天职，实现‘王道正直’的大理想”，欧美各国只是“想吸点膏血，赚我们几文，唯有日本除了要金钱和物质之外，还处心积虑要在我们的头上施行‘王道’”。傅斯年对此论甚为赞赏：“刘叔雅先生之《日本侵略中国之发动机》，这是一篇值得国人永久注意的文章。”

再次，倡导中西汇通。清末民国，一味崇古与全盘西化之风于学界流行。用刘文典的话，即学者“始终把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看得和西洋近代的学术思想是个对峙的匹敌，硬要把两个不相干的东西往一起拉拢，既忘却本国学术的价值，把别国学术的价值又没有看清楚，所以费了老大的气力，其结果还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徒劳”。故贬中抬西，或扬中抑西，皆非明智：“如果读了（古书）只能据以推定当时科学程度已经很高，对他表示相当的崇敬，要是因此就说中国古代科学高于西洋的今日那就和那些妄人看见有书上说墨子造过飞鸢，说他会造飞艇飞机都是一般的说梦话。”刘主张真正的中西学术沟通应是“要有那些好学深思之士，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好虚体面的客气，晓得了近世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明白了学术之历史的发达路径，把中西学术作个比较研究，求两系文明的化合，这倒是学界一种绝大的胜业，要照这样的沟通，中国的玄学、心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可以和西洋学术沟通的处所多着哩”。对于中西学术的互相沟通，刘文典身体力行，主政清华大学中文系期间，刘曾尝试将中文系课程的设置仿照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英文系的模式，以加强中西汇通。

陈独秀的革命豪情、刘师培的学术功底，加上章太炎的魏晋风度，刘文典一一耳闻目睹，又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有这3位名师的真元之气护体罩身，刘文典学问焉能不佳？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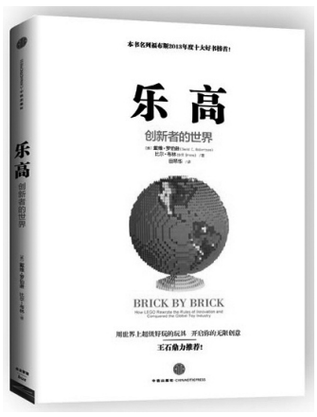
书名：《中国周边国家与合作组织》

作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出版：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

推荐人：王毅 外交部部长

推荐语：本书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和论述我国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的专著，也是对加强我国周边外交工作的有益理论探索。周边地区在世界政治、战略、经济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战略重心大幅度向我国周边地区倾斜。尽管我国周边地区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和挑战因素，但和平、合作、发展仍是主流。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成为地区和平最坚定的捍卫者和地区发展最有力的促进者，中国的发展和振兴必将持续不断地造福于本地区各国人民。



书名：《乐高：创新者的世界》

作者：[美]戴维·罗伯逊 比尔·布林/著 田琴华/译

出版：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

推荐人：陈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推荐语：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然而，正如哈佛商学院杰出的管理学者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所揭示的，许多企业在豪言壮语般提出加强创新工作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是战略不当、新业务和传统业务相冲突、管理流程控制过严，以及领导力、沟通氛围不足。因此，企业需要的不仅是创新，更要开展有效的创新管理，才能真正发挥创新在提高企业财务绩效和持续竞争力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书名：《国研专家展望中国改革下一步》

作者：包月阳/主编

出版：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4月

编者谈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深刻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矛盾和任务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对社会各方深化改革的诸多诉求和期待给予了明确和积极的回应。本书精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知名专家学者以三中全会后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发展问题为主题，从理论、对策和战略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的系列文章，在传达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的同时，提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批判。



书名：《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

作者：[日]佐藤慎一/著 刘岳兵/译

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

编者谈书：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在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对外关系由朝贡体制转换为条约体制，而且国土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从王朝体制到共和体制转换的时期。生活在这种激荡的旋涡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是如何认识所处环境的变化以及他们想使中国如何变化，是本书所要解决的主题。《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以凝练的笔法、独特的视角，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认识的转换过程，以及他们各具特色的心路历程。

书评的距离

□杨建民

最近正在读两本书：英国李约瑟先生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两部书都写于五六十年前，中文版距今也已近30年了。可是，个人认为，无论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考察的缜密，还是推论的恰切并富于启示，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还未见人能及李约瑟先生；至于冯友兰先生叙述之清晰，语言之流畅，观点之精当，更非一般著述哲学文章所能企及。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著作一点没有因时间流变而失色。细细咀嚼它们，我不仅得到许多知识的启发，更从中获得许多“思维的乐趣”。

由此，我想到书与书评的距离。眼下的书评，在数量上是较为有限的。就这有限的书评，百90%还都给了刚刚面世甚至还未来得及面世的图书。这些未经过时间沉淀的书评，除去很少确有真知灼见，又能不为哥儿们友情所惑的文字，极易流于广告。

笔者认为，书评与书之间，是需有一段距离的。这距离可分两方面。一为时间距离。就我们的阅读经验看，许多著述，是需经过一段时间（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时间）洗汰才可发现其价值有无的。书评来得太快，一些经时间洗涤逐步显露光泽，当时并未被充分注意的书就可能长久掩埋，难为人们汲取营养。譬如前面所举《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国哲学简史》等。而一些初粗看来还过得去的东西，保不准几个月后便会销声匿迹，这种情况在媒体发达的今天尤其见得多。

再有一些大部头套书，尚未面世，便召开发布会。学者名流、政府要员请一个遍。分明刚刚交给的书，便要他们发言表态，硬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个时间差距是不是太小了点儿？这样发行式的报道或座谈会纪要，我能随便听听，然后追着去买他们推荐的书？

曾有一本尚未全部面世的小说，被数个有条件先睹为快者称为“可以走向世界的经典”，措辞极为“前卫”。但从实际刊出的几章看，似乎手法运用、文字精纯方面还未见十分到位。一位评论家读过后大约还不很自信，希望自己能抽时间再读一次才可发言，态度虽不明朗但却较为可靠。

时间距离外，还有人情距离，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倘若朋友同行一部书写得的确很好，书评者在喜欢书的前提下予以评述，这无可厚非。倘若纯出于友情，失却评判标准，叙说一番作者的生活情况或彼此友情等书内容以外的话题，或干脆当个吹鼓手，“经典”“传世”“深刻”等等一阵乱喷，设一个被人称为美丽的“文字陷阱”，成为促销广告，把读者引个懵头转向，使他们在破费了时间金钱后，才发现自己买的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这就不仅大大败坏了书评的声誉，而且很有些图财害命的意思（鲁迅先生曾说：无端浪费别人时间，其实是无异于图财害命）。最近有消息报道，两本重要的学术刊物，已停止刊登书评文章。此举虽然显得有些严厉，但无奈的心情却颇令人理解。

早在30年代就为书评事业作出很大努力的萧乾先生，当年就订下一个原则：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这样就自觉拉开了人情距离，使书评多了可靠不欺骗的学术分量。至于时间距离，我想报刊编辑们也当有意识关注一些已经过往但仍有意义、价值的书，或约请一些作者，写一些在他们阅历中发挥大作用的书的评论，将那些真正饱含人类精神精粹的作品张扬出来，这样不仅传递了文化的文明火种，也可挽救眼下书评声誉下滑的颓势。从这个角度去考察，“距离”又几乎是对书评者学术能力和文化良知的丈量了。

书海泛舟

用写作架起浅阅读和深阅读之间的桥梁

□宫春科

网络时代，时时有人感叹阅读的人少了，此话其实并不准确。从手提电脑、iPad到智能手机，甚至是公交地铁上的滚动电子屏，阅读不一定需要在书房、教室、图书馆，阅读已无处不在，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你识字，阅读就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你，这是大数据冲击下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无奈选择。

阅读的面广了，深度自然就难以确保，每一个人从感知到记忆思考，精力是有限的，就好像是一瓶水，在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容器越大，播撒面越宽，深度自然就越浅。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社会，人们并不是阅读少了，恰恰相反，阅读的方式越多，阅读的量越大，阅读的层次和质量就难以保证。因此，在这个时代，浅阅读这个词也就应运而生。

浅阅读的好与坏，各执一词，存在争议。但总的看，赞成浅阅读的一方并不反对深阅读，而是把浅阅读与不阅读相比较，其潜台词是浅阅读比不阅读好。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只要是识字之人，不可能不阅读，信息时代，阅读没有有无之分，只有主动与被动，多与少，质量高与低的差别。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无法对任何信息都进行深入细致的关注和阅读，浅阅读对大数据的一个选择过程，是深阅读的一个前提和准备。阅读本身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浅阅读和深阅读是阅读的两个不同阶段，单纯的浅阅读可以看成是由于各种原因而被终止的深阅读。因此，不能单纯地反对浅阅读，不能割裂浅阅读和深阅读的关系去看待浅阅读，推进深阅读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浅阅读的过程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以此为基点进行仔细阅读思考和研究。

事实上，读和写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两者相互关联，唇齿相依。写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或者别人看，唤起记忆，交换信息，交流情感，引起别人的思考。写同时为读提供素材，没有写何来读。没有读的关注何来写的动力。如何在浅阅读和深阅读之间架起桥梁，让有价值的浅阅读深化为更有价值的深阅读，写的作用必不可少。写是更深层次的读，写的过程也具有层次性，按照写的层次性要求展开四步写作法，通过写的深入将读引向深入，从而把浅阅读变成深阅读。

用“笔”记下只言片语。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随时随地在口袋里装上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的书写存储功能也能用上。在无处不在的阅读中把切实震颤心灵、引起思考的内容以最简单的方式写下来、存起来。不要放弃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在教室、寝室、卧室、阅览室等地方，在休闲等待的空闲时间，拿到能够取到的杂志书籍，摘抄其中的关键字句并留下最能方便再次检索到的关键信息，做好写的第一步。

时时整理连点成片。有空闲的时候，逼着自己写一点稍微成形的文章，不限长短，不论格式，无论是叙说也好，评论也罢，都可以。主题和素材就是记录在小本子或手机、iPad里的只言片语，想想它们为什么能够打动自己，再就与此相关的文章书籍资料找找翻翻读读最后再写写，将这些只言片语拉长变宽，加深加固，不为发表，不为交流，通过写来促进思考引起进一步阅读的兴趣，让自己的思想更深刻起来，情感更集中起来。

精心修饰发表发布。文章写出来是给人看的，要有不为功利的适当发表发布意识，发布在博客上也好，发表在杂志上也罢，精心修饰，充实完善，让要表达的观点更鲜明深刻，让素材更生动感人更能说服人，让篇章结构更完整简洁，让语言更朴素生动，让更多的文章发表发布，尽力引起更多人的点击翻阅和关注，激发自己的成就感，增强更多阅读的信心和动力。

加强互动引发思考。对于发布或者发表的作品，时时关注读者的意见和评论，通过各种平台和他们多交流甚至是争论，在互动中找到自己思考写作的缺陷不足，对认识错误或认识不清的问题或者在评论争论中产生新的想法，围绕着它们去做有针对性的查阅阅读和思考，重新回到第一步，更有目的去阅读浩瀚无边的信息世界。如此循环往复，写就可以成为沟通浅阅读和深阅读之间的桥梁，让阅读的兴趣更浓，动力更足，价值更大。

读书方法